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香 港 文 化 研 究 叢 書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歷史的偶然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in Hong Kong
Wong Wang Chi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BN 0 19 590066 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
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叢書策劃：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主編：陳清僑 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主任

編輯委員會成員：

陳坤耀 香港嶺南學院院長
周英雄 台灣交通大學文學院院長/外文系教授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副校長
劉紹銘 香港嶺南學院文學院院長/翻譯系講座教授
李湛恩 美國萊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
廖炳惠 台灣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鄭樹森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文學系教授
黃德偉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

* 本計劃之部分研究及出版經費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

本書討論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曹聚仁、李輝英、徐訏、司馬長風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

書寫文學史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客觀地敘述歷史，同時又主觀地評價文學作家和作品。香港的這些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相對於當時海峽兩岸的來說，作者不約而同都強調：以個人的文學史理念、以客觀的、中立的、非政治的態度去論述中國現代文學史。

本書作者指出，當文學史家宣稱採取非政治態度時，實際上就是對主流政治的一種抗衡。所謂歷史敘述和文學評論，取決於文學史家的立場和位置。在本書中，作者論述了個人與集體對歷史書寫的不同。從中我們可進一步質疑的是，史家所謂持中、平正的史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作者王宏志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副教授。著有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思想激流下的中國命運：魯迅與左聯》、《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及《詩人朱湘懷念集》，合著有《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

HW-029/10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編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陳清僑編

香港電影類型論

羅卡 吳昊 卓伯棠合著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

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

陳清僑編

香港文學的流變

黃繼持 鄭樹森 盧瑋鑾合著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著

情感的實踐

香港流行歌詞研究

陳清僑編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

羅永生編

目 錄

第一章

(非) 政治論述

—— 香港與中國現代文學史 1

第二章

見證文學史

—— 曹聚仁和他的《文壇五十年》 63

第三章

教科書式的現代文學史

—— 論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和《中國新文學廿年》 95

第四章

一部最初的中國新文學史？

—— 論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 111

第五章

心造的幻影

—— 談徐訏的《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 151

參考書目 169

後記 179

第一章

(非) 政治論述

香港與中國現代文學史

一

本書所討論的，是過去幾十年在香港編寫及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新文學史），①主要為曹聚仁的《文壇五十年》上、下編（曹聚仁 1955a、1955b）、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李輝英 1970a）、徐訐的《中國現代文學過眼錄》（徐訐 1991）和司馬長風的三卷本《中國新文學史》（司馬長風 1975b、1976、1978）四種。②此外，我們在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章裏，還會稍為討論一下他以「林莽」的筆名所編寫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廿年》（李輝英 1957）。③

① 「現代文學史」和「新文學史」兩個詞所涵蓋的觀念並不完全相同，下文會再詳細分析二者的異同。為行文方便及統一起見，文中大部分情形以「現代文學」來作通稱。

② 值得一提的還有康培初在《文學作家時代》一書中所收的〈中國現代文學（綱目）〉。這分綱目共有十頁，將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九年間的現代文學發展分為五期：（一）文學改良運動（一八九八—一九一七）；（二）新文學的倡導（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三）新文學的發展（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四）變革時期的文學（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五）從抗戰到復員期間的文學（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康培初 1975：211-220）。據康培初在該書〈後記〉中說：這原來是為紀念「五四」三十周年的講話大綱（1975：222），文末還署上「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於中山教育學院寫成」。雖然這是一個頗為完整的現代文學發展架構，但不能算是一部現代文學史，所以不能收在本書一併討論。事實上，儘管在香港住上了一段「不很短的時期」（1975：221），但該書的後記所署為「康培初記時客香港」（1975：225）。畢竟，他也只是香港的「過客」。

在這五種著作中，只有兩種是以「文學史」命名的，曹聚仁、徐訏以及林莽的著作都沒有自稱為文學史，但我仍把它們視作文學史處理，原因是它們都能夠相當完整，且自成一體地論述了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確是能夠完成文學史的職責。此外，不以文學史命名，而實際在內涵上與文學史完全無異的例子很多，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 1924）、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朱自清 1982）、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源流》（周作人 1932）、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伍啟元 1934）、王丰園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王丰園 1935）以至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李何林 1939）等，一些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文章和專著，都幾乎一定會討論這些著作（參黃修己 1995：1-70；馮光廉、譚桂林 1995：3-6）。

但在討論個別的文學史著前，首先要處理好幾個大問題。

第一是時間：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

第二是地點：香港。

- ③ 就我所見到的資料中，李輝英並沒有說過「林莽」是自己的筆名，《中國新文學廿年》是他的著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後記〉中，他談到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過程時，只說原來有一部草稿，草稿「簡單潦草」，經補充及由上課的同學繕抄後，便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前身（李輝英 1970：363），給人一種感覺是與《中國新文學廿年》毫無關係的。黃修己在討論幾種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時，便把《中國新文學廿年》與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分開討論，看成是截然無關的兩部著作（黃修己 1995：419-424）。不過，收在馬蹄疾所編輯《香港文叢·李輝英卷》內呂剛的〈李輝英作品年表〉中，即有列出《中國新文學廿年》（呂剛 1995：223）；馬蹄疾在一篇文章中，也列出了「林莽」，作為李輝英其中的一個筆名（馬蹄疾 1995：226）。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李輝英」一項的著作簡目裏，列有《中國新文學二十年》，但出版時間為一九六九年（劉以鬯 1996：32）。此外，《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中「李輝英」條，也記有「林莽——見於《中國新文學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7 年出版」（徐適翔、欽鴻 1988：257）。

第三是研究主體：中國現代文學史。

在下面的章節裏，我們會仔細看看這幾個問題。

二

在香港的歷史裏，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至為重要，尤其是七十年代初，不少論者已指出：這是香港本土意識開始形成的時期。

眾所周知，香港在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時，只不過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小島，全島只住了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一人（Tsai 1994：9），可是，到了一九五零年底，香港（連同九龍及新界）已有二百三十六萬人，而一九七一年的人口更接近四百萬（Young 1994：131, 146）。換言之，在這一百三十年裏，香港人口增加了三百多倍。顯然，這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口，「來源地」是中國大陸。

香港位處於南中國的末端，是名副其實的「邊緣」，加上它本身並沒有甚麼天然資源，長久以來，對於中國大陸，並沒有甚麼吸引之處，在它的統治者眼中，香港只不過是一處「粵海之藏污納垢者」（陳倫炯 1958：5）。但在「鴉片戰爭」以後，它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變成了另一個政治實體，情況便起了重大的變化。對中國大陸一般平民百姓來說，最重要的地方，在於香港能夠扮演一個避難所的角色，每當內陸出現社會動盪不安的形勢時，沿海一帶的人便會湧到香港來。此外，還有的是所謂的「政治異見人士」，在大陸受到壓迫的，也會跑到香港來尋求庇護，從「長毛狀元」王韜到戊戌政變時的康有為，從國父孫中山到國共內戰期間的左翼作家，從「六四」民運人士到王希哲，情形都是這樣；加上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相對來說，政治及社會狀況都比較穩定，所以，早在三十年代，香港已成為一個相當吸引的地

方。^④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香港便承受了好幾次大規模的難民潮，大批國內居民湧到香港來。

不過，大部分跑來香港避難的中國人，並不打算落地生根，以香港為家。每當國內的情況轉好的時候，他們便又會返回中國的「家園」去，這是傳統中國愛土重遷的心理。此外，大部分人對在居住於外國人的殖民統治下，也有強烈的恐懼及抗拒，在割讓之初，香港便出現過好幾次大規模的抗英行動（Tsai 1994：9-25），加上不少國內作家和文人對香港重覆地進行負面的描寫，使香港始終擺脫不了「藏污納垢」的形象，^⑤而他們又往往特別強調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刻意地將香港寫成是一個「外國的」地方，^⑥結果，偉大如魯迅也無法客觀地觀照香港，在兩篇談到香港的文章裏，他都開宗明義地說香港是一個「畏途」（魯迅 1981 III：427-437；535-542）。^⑦於是，每當大陸的混亂局勢過去後，又或是香港本身出現動盪時，他們便會馬上離開，最嚴重的一次莫如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開始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才結束的「省港大罷工」，最高峰時便曾有二十五萬人離開香港，跑到廣州去，使香港變成死寂一

④ 例如二難：〈香港一瞥〉中說：「香港之種種情形，我一見後，不禁佩服英人辦事魄力之雄厚，雖號稱『中國之花』之上海，幾不可比擬」（盧瑋鑾 1983：75）。

⑤ 盧瑋鑾編的《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所收文章不少都對香港的情況作了負面的描述，攻擊的目標主要是貧富懸殊、居住環境惡劣、賭、娼、貪污問題嚴重以及中國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盧瑋鑾 1983）。

⑥ 例如張若谷的〈香港與九龍〉，便有「跨出國境第一步／人是黃裔地已非」、「這一個亞洲的大都市已不是中國所有的了。是英國的城市，是香港」（盧瑋鑾 1983：39-45）。

⑦ 關於大陸文人和作家對香港的論述，可參王宏志〈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李小良、王宏志、陳清僑 1997）。

片(Chan 1994: 45)。^⑧此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佔領香港，儘管廣東沿海一帶也早已淪陷，但香港的居民還是寧願跑回大陸去。因此，來港和離港的中國人就真的像潮水一樣，有漲有回。但相對來說，還是來的多，去的少，所以，香港的人口一直在大幅增長。^⑨

不過，這有漲有回的情況，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便開始改變。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六日，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邊界正式封閉，人們不再可以自由往返。另一方面，大陸政權易手，實施共產主義統治，造成前所未有的難民潮。單單在一九五零年首六個月內，便有超過七十萬名難民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從一九四六年的一百六十萬增加至一九五零年底的二百三十六萬(Young 1994: 131)。這些人來到香港後，都不願或不能回去，當中包括很多原以為利用香港作踏腳石的人，他們準備追隨國民政府到台灣去，可是最後也「滯留」下來。從六十年代開始，願意回中國大陸、又或是能夠到台灣去的，都早已經離開了，而很多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也迫不得已暫時以香港為家。

更重要的是，港英殖民地統治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開始改變，主因之一是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據香港官方的統計數字，這次暴動歷時四個月，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拘捕，對香港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不過，意料不到的是，這事件為香港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深遠而積極的影響，那就是「香港意識」的建立。

⑧ 關於省港大罷工，可參 Motz 1972；Chung 1969。

⑨ 關於十九世紀香港人口的具體數字，可參余繩武、劉存寬 1993: 299-302。該書所本為當年的人口調查報告，主要來源為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香港政府憲報及英國議會文書。

我們知道，英國人最早要求割讓海島，目的並不是要從這小海島攫取利益，而是把香港視為踏腳石，從而開發中國的市場。雖然香港本身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埠，但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冷戰時代」以前，香港主要扮演的是一個轉口埠的角色。因此，英國在香港所實施的殖民地統治比較特別，它始終沒有強行把香港跟中國原來的聯繫切斷，或是以英國模式強加在一般香港市民身上。早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兩廣總督琦善與英國代表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簽訂〈穿鼻草約〉（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後，雖然草約仍未經清廷批准，義律即在二月一日張貼告示，曉諭香港居民：「爾等居民亦得以英女皇名義享受英國官吏之保護，一切禮教儀式風俗習慣及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用。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廣角鏡 1981：164）；第二天，又再貼出另一張公告，告示英國及外國僑民，重申「島上居民，應照中國法律習慣統治之」（1981：167）。翌年，正式簽訂南京條約後，十月二十七日，英國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也在香港貼出告示，強調「尊重華人習慣」（陳謙 1989：3-4；參 Sayer 1937：103）。因此，一直以來，香港人都過着跟中國人相同的生活模式，這既有其地理因素，也有政策上的原因，但無論如何，這是香港沒有能夠建立自己特殊身份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始終把自己認同為中國人，上面提到，香港人沒有以香港為家，且時常跑回大陸去，就是這個意思。在這情形下，「香港意識」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但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卻很特別，儘管這次暴動與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密切關係——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一個極左路線的火紅年代——不過，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分

析，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裏，香港居民第一次認定港英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絕大部分人都不認同親中「暴徒」的行徑（Young 1994：140）。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變。此外，經歷過這次嚴峻的考驗後，為了避免再出現類似的社會不安事件，港英政府重新檢視了它的殖民地統治策略。一九七一年履任的港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開始採取了一種比較親民的政策，並推行一連串的改革，例如修訂勞工法例，設立勞工法庭，甚至開始提供免費小學教育。此外，政府亦着重加強「香港為家」的觀念，舉辦了很多活動，最重要的是「香港節」，大型的遊行和相關活動，不單是用以粉飾太平，而更重要是建立香港意識；另外還有的是一些特別為年青人而設的活動，諸如新潮舞會、青年聚談會等，也增強了年青人對香港的歸屬感。這對港英政府的統治有積極和正面的作用，算得上是一九六七年大暴動所帶來的一個間接影響。

此外，香港經濟在六十年代也開始了長足的發展，^⑩為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做好了準備，使香港成為亞太最早富裕起來的地區，這也有助於香港身份的建立（六十年代，差不多每一個香港人都去過「工業展覽會」）。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第一代在香港出生、又或是在孩提時代跟隨父母來香港的人正慢慢成長。對於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生於斯，長於斯，除了香港以外，根本也沒有別的「家」了。因此，在香港發展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⑪

⑩ 在一九六零到一九六九的十年裏，香港的製造業工廠從5346家增加到14,078家，僱用人數由224,000多人增加到524,000多人；港產品出口從約二十九億元增加到105億元；進出口貿易從98億元增加到281億元（金應熙 1996：110）。

表面看來，香港意識的建立，有可能帶動一種以香港意識為主體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和撰寫的出現。不過，事實並不是這樣。六、七十年代香港意識的出現，對於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幾乎沒有絲毫的影響。

首先，港英政府的新政策，主要的對象是年青人，例如上面提到的青年舞會以及「香港節」等。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新政策主要是針對一九六七年的暴動，目的是要讓年青人的精力得到宣洩，而一些福利政策的服務對象也主要是一般勞苦大眾。雖然這些政策有助於建立年青人和普羅市民的香港本土意識，增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但對於當時的學術研究並沒有幫助。第二，經濟起飛無疑是能夠令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卻使香港社會變得更商業化、更市場化，這樣的社會環境，跟需要長年累月積累資料的文學史研究工作，絲毫扯不上關係，甚至會產生負面的作用。這點在下文再有討論。而更重要的是，直至七十年代，儘管香港意識慢慢開始出現，但香港仍沒有馬上能夠培育出一批土生土長、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學有專長的學者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上面提到在這時候逐漸成長的土生和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那時候還是在唸中學，最多是在大學的求學階段，根本不可能撰寫出嚴肅的學術著作來；另一方面，即使戰前和戰後香港大學中文系確實能夠培養出一些本土的學者，在學術界有所撰述及成就，他們也不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專家，在六七十年代寫出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來。這涉及到香港的中文教育歷史。

⑪ 一份在一九八五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八十年代，有百分之五十九點五的受訪者，在「我是中國人」與「我是香港人」的選擇中選擇後者。另外，該調查亦有討論這種香港身份跟中國大陸以及中國文化的種種關係（Lau & Kuan 1988）。

我們知道，在六十年代——或更準確一點的說，在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以前，香港大學是香港唯一的一所大學。香港大學正式成立於一九一二年。在最早的倡議階段裏，香港的總督盧吉（Sir Frederick Lugard）期望香港大學能夠成為「遠東的牛津和劍橋」（Ng 1984：124）。不能否認，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香港大學是一所名副其實的殖民地大學，但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略的，就是從倡議的階段開始，人們已認定香港大學不單只會為香港居民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又或是只會對英國政府有利，它同時還應該為內地的中國人服務，對中國政府作出貢獻。這是因為清廷這時候正積極推動西學，每年都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去，假如香港能有一所西方式的高等學府，便能省回很多人力物力，而學生也可以時常回大陸去，不會跟中國完全割離。正因這個緣故，籌建香港大學的計劃便得到中國政府和香港居民的支持，兩廣總督張人駿撥款二十萬元，香港居民則合共籌得三十萬元，作為興建香港第一所大學之用（1984：125-129），而兩廣總督就跟香港總督一樣，成為香港大學的「當然贊助人」（*ex-officio patron*）（盧瑋鑾 1996：112）；也正因為這個緣故，香港大學始終跟中國大陸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香港大學原先計劃只先設醫、工兩科，但翌年即增設了文學院，有學生二十人。^⑫在最初的階段裏，中文科屬一年普及選修課目，由兩位原翰林學士賴際熙及區大典講授經史，一直以來，是要求學生「對於經史有深切的了解」，而採用的方法，則是「偏重記誦之學」（金應熙 1996：173）。不過，這種培養舊式學者的經史教學卻引來很多的不滿，一九二六年威靈

⑫ 一九一三年初，整所香港大學共有學生七十二人——工科生三十一人，醫科生二十一人，而文科生則有二十人。參 Ng 1984：129。